

# 经史兼宗：金景芳的经学思想与成就

舒大刚 马 琛

(四川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金景芳是 20 世纪卓有成就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平生精力所萃, 论著所关, 皆在于探讨经学和运用经学成果研究古史, 经史互为辅翼, 发幽阐微, 遂臻妙境。金景芳早年涵泳经文, 治经以明义例为要, 于《易》义、《春秋》例、《礼》制均深有所得, 著成《易通》《春秋释要》《论礼》等论著, “尤精于《易》及《春秋》两经”。经例既明, 先生遂据此抉发儒经大旨, 据《礼》言制, 因《诗》说义, 关注《礼》《诗》的垂范价值。其晚年, 依经立说, 发微阐幽, 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周易》《尚书》经典阐释上, 出版《周易讲座》《周易全解》《〈尚书·虞夏书〉新解》等力作。纵观金景芳一生的经学研究, 可见其优于经学、由经入史、经史兼宗的治学特色。

**关键词:** 金景芳; 经学; 古史; 治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2) 10-0025-09

“经学”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 在中国历史中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晚清以来, 虽然引进西方教育模式、改革教育制度, 但“经学”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并未完全消失。不仅未消失, 而且由于“经学”与现代新知的有机结合, 产生了一大批学术大师。这批大师运用新方法、新观点, 利用经典等旧材料, 解开中国历史谜团, 开启中华学术新局面, 树立起学术创新创造的新范式。与世纪同行的金景芳先生(1902—2001)就是其中非常成功、影响较大的一位。先生由经入史, 学开一派, 是当代“经史兼宗”学者的突出代表。

金景芳先生一生游教上庠, 研经习典, 著作等身, 先后出版《易通》《经学概论》《学易四种》《周易讲座》《周易全解》《〈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尚书·虞夏书〉新解》等经学著作; 《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论井田制度》《中国奴隶社会史》等史学著作; 《先秦思想史》《先秦思想史专题讲授提纲》《孔子新传》等思想史著作; 《古史论集》《金景芳古史论集》《金景芳晚年自选集》《知止老人论学》《鬻年谈易》等论文集。还著有《金景芳学术自传》概述自己治学历程和主要成果; 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序跋、自述、诗词又 20 余篇。

金景芳平生治学, 初以读经立本, 研经成名; 中年由经入史, 经史皆宗; 晚年又依经立说, 开辟新经学。考察先生的学术专著, 在 13 部中有经学 7 部、思想史 3 部、史学 3 部; 在其 100 余篇论文中, 有经学论文 33 篇、礼学制度 13 篇、孔子及儒学 28 篇、子学史学 24 篇, 此外在 10 篇序跋中也有 6 篇有关儒学。明显可见其优于经学、由经入史、经史兼宗的治学特色。

**作者简介:** 舒大刚,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 历史文献学、中国儒学; 马琛,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生, 专业方向: 历史文献学。

## 一、尊经重传：金景芳的经学思想

金景芳先生讨论经学问题的成果最多，成就也最高。对经学基本问题、重要经典（《诗》《易》《书》《周礼》《春秋》等）、经学义例、古礼经制（井田制、宗法制、分封制、丧服制、甲子等）、经典删定者（孔子）、经学弘扬者（孔子、孟子、荀子等），都有专著和系列论文讨论；于经学的转化利用（历史研究、思想史阐发）、人才培养，也有专著和讲义。其形式既有综论，也有详解；既入乎经，又出乎史；经史结合，相得益彰。金景芳博览诸家，截断众流，排难解纷，独树一帜，形成关于经学的系统思想理论。如解释“经学”，在“圣学”“道枢”等说外，直谓“经学者，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研究对象之学也”<sup>①</sup>，破除旧时许多神秘莫测、恍惚飘渺之说。于“经”字本义，先生在“常道”“不刊之书”“圣人所制”“经天地，纬人伦”“编简连缀”等说外，独取“经”者“径也”之说，以为“考《说文·糸部》曰‘经，织从丝也。’（从段玉裁校）从丝即纵丝，取径直之义。凡字之从巫者，如茎、颈、磴、泾、胫等，皆从径直得义，非特经字然也。”<sup>②</sup>又说“六经”称“经”，乃与“传”“记”两相对待，“犹人有子矣，而后立父之号”<sup>③</sup>，取章学诚“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sup>④</sup>之说。

金景芳先生于治“经”门径，尤有卓识。其《研治经学的方法》提出“祛成见、别正伪、识宗趣、观会通、明家法、尊古说、重参稽、阙疑殆”<sup>⑤</sup>八法，以为“盖必成见祛，乃能别正伪；亦惟家法明，方知尊古说。至识宗趣，则了解一经之特殊性；观会通，则发见六经之共同性；同而知其异，睽而知其通，本末兼该，体用一贯。而复参验稽决，疑殆阙之，虽或未至，所失盖寡”<sup>⑥</sup>。先生还提倡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立足本土，借鉴外来“方今国制民主，思想自由，席清儒之隆业，有西学为借鉴，不务求之则已，如务求之，定能事半功倍。”<sup>⑦</sup>这些都是极为通达之论。

至于“经学史”分期问题，金景芳先生于《四库全书总目》“六期”<sup>⑧</sup>、皮锡瑞《经学历史》“十期”<sup>⑨</sup>等说外，根据经学文献、治经风格演进之情形，提出“传记（战国）、笺注（两汉三国）、义疏（南北朝隋唐五代）、革新（宋元明）、复古（清）”<sup>⑩</sup>五期，极合乎中国经学发展演变之实际，也有利于对各个时期特征之把握。面对甚嚣尘上的疑古非孔思潮，先生大声疾呼：“六经俱孔子手定。故言经学，宜断自孔子……盖孔子天纵之圣，触处洞然，即于古籍之中，发见真理，标立新义……故六经为孔子所独有，其前虽有孕育之功，只可以史料视之，未足以当经学之目。”<sup>⑪</sup>这就分清了经典依据和经学体系的内在区别。

在金景芳先生经学思想中，最特别的贡献是坚持“六经”的典则意义和信史价值，认为“六经”是孔子留给世人的“珍贵的遗产”，研究孔子不能忘记“六经”，研究中国历史也不能不利用“六

①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81页。

②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83页。

③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83页。

④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3页。

⑤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02-2808页。

⑥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07-2808页。

⑦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08页。

⑧ “六期”为两汉经学时期、魏晋至北宋杂学时期、两宋理学时期、宋末至明初恪守程朱之说时期、明正德嘉靖以后心学时期、清初考据学派时期。参见永瑛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

⑨ “十期”为“经学开辟时代”（春秋）、“经学流传时代”（战国）、“经学昌明时代”（西汉）、“经学极盛时代”（东汉）、“经学中衰时代”（魏晋）、“经学分离时代”（南北朝）、“经学统一时代”（隋唐）、“经学变古时代”（两宋）、“经学积衰时代”（元明）、“经学复盛时代”（清朝）。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⑩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95-2802页。

⑪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95页。

经”。《庄子·天运》谓“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六经”记载“尧舜之道”与“周召之迹”。前人每谓“六经皆史”，如果从“六经”是依据历史文献删定整理而成来理解，无疑是对的。金景芳正是善于利用“六经”史料，撰著出《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论井田制度》《中国奴隶社会史》等重要著作，对中国上古历史进行了系统阐述。

金景芳先生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发表长文《经学与史学》，提出经学与史学研究新任务，认为由于时代变迁，学术研究的任务也要与时俱进，适时改通，“今日我们研究经学与过去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研究经学根本不同……今日研究经学则不然，乃是把它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sup>①</sup>。而史学研究也有别于旧日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碑立传的“正史”体系的旧史学，“今日研究史学，不独以才、学、识见长，更重要的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从而为当前的政治服务”<sup>②</sup>。新史学研究“从历史实际出发……不能不对经学予以足够的重视”<sup>③</sup>。经学特别是经典，既是中华上古历史唯一系统的记录，也是中华文化寻根溯源、老干新姿的重要依据。我们研究中华上古史，就必须以经典或经学为核心依据，再参以其他史料来补充完善。《庄子·天下》谓“《诗》以言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分别从文学、史学、制度、音乐、哲学、政治等各个方面，记录和解释了上古时期历史面貌，今天研究上古历史自然就不能离开“六经”。

## 二、经例概说 《易通》与《春秋释要》

金景芳先生治经，喜言义例，善说微言，涵泳经文，揭示义理。学人公认金景芳“尤精于《易》及《春秋》两经”<sup>④</sup>。《金景芳学术自传》自谓“在复性书院学习，有两件事”值得重视。其一为“写《易通》一书”；其二为“读《春秋》三传，写出心得体会，名为《春秋释要》”。<sup>⑤</sup>

《易通》一书写于“抗战”期间，金景芳先生在1939年于辗转迁校途中购得傅子东译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附录有《谈谈辩证法问题》，读而有悟，遂以辩证思想解说《易》例，竭一冬之力撰成《易通》。《易通》是一部系统的“易学概论”，也是中国学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周易》研究的早期著作，是书1942年获当时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易通》共分十章，依次讨论《周易》之命名、《易》学之起源与发展、先哲作《易》之目的、《易》之体系、《易》之特质、象数义理、筮仪考、《周易》与孔子、《周易》与老子、《周易》与唯物辩证法等问题。针对当时疑古否经运动，先生于《易通》序中慨然宣称“中国哲学，综为二大宗派，而以孔、老二大哲人为开山。二哲之思想结晶，则在《周易》与《老子》。是二书也，体大思精，并为百代所祖。而尤以《周易》为最正确，最有体系。洵吾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sup>⑥</sup>

书中批评汉儒象数、宋儒图书，力标孔子《易传》、王弼《略例》、程子《易传》创立的义理路径，自表治《易》“目的在求真理”！<sup>⑦</sup>书中一再说“《易》之用在发明宇宙真理，以为人生准则。”<sup>⑧</sup>“先哲作《易》，其目的在将其已由变动不居之宇宙现象中所发见之自然法则及社会法则，用

① 《金景芳全集》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38-3139页。

② 《金景芳全集》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39页。

③ 《金景芳全集》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39页。

④ 罗继祖《金晓邨教授九五寿言》，载《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⑤ 《金景芳全集》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11页。

⑥ 《金景芳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页。

⑦ 《金景芳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页。

⑧ 《金景芳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蓍卦等符号衍变之方式表出之，以作人生行为之指针。”<sup>①</sup>“具体以言，则即‘天之道’与‘民之故’。以今语释之，则即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sup>②</sup>先生阐释象数与义理的关系云“《易》兼象数义理”，“象含于卦，而卦者，《易》之体也；数生于蓍，而蓍者，《易》之用也。故象数备而《易》之体用该矣，焉有歧象数而言理，尚得谓之《易》乎？”<sup>③</sup>要言之，象数都是为义理服务，同时也是不能脱离义理而独立存在的。在孔子与《易传》的关系问题上，该书相信司马迁“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提出“研究孔子学说当以六经为准，尤当侧重《易》与《春秋》”。<sup>④</sup>并从孔子的哲学基础、人生观、论仁、论诚等方面列举数十节目，论证孔子思想与《易传》内容的一致性。用同样的方法，本书又对老子与《周易》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得出“老子哲学与《易》不同《易》为唯物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的、实证的哲学；老子则为唯心的、消极的、保守的、个人的、内省的哲学”<sup>⑤</sup>的结论，两者不是同一体系。该书尤为特出的是在国统区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解释《周易》，感慨“中国之《周易》与西土之唯物辩证法，事隔几千年，地距几万里，而其说若合符节，洵属大奇！”<sup>⑥</sup>通过互证，书中发现：辩证法三大法则即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质变与量变，皆与《周易》暗相符合！这在风雨如磐的年代，无异于石破天惊，惊世骇俗！

《春秋释要》是金景芳在复性书院广读正续编《清经解》，涵泳《春秋》“三传”及诸家注疏，得其精髓而后撰成的，收入复性书院论丛《吹万集》中。《春秋释要》揭示了《春秋》经传的整体风貌，也解释了《春秋》学史上争论不休的关键问题。先生继承治经必求义例的方法，将《春秋》经学问题归纳为“名义”“宗旨”“原始”“笔削”“大义”“微言”六个方面，一一加以申说解读，对《春秋》经传之义例、原理、主旨、书法以及孔子与《春秋》之关系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系统考述和辩驳。先生根据《史记》“主鲁亲周”一语，而悟何休“黜周王鲁”说之非；谓“三世”“内外”特以远近详略而异辞，不可并为一谈；在《春秋》释名上，则以为《春秋》得名于上古以年为“春秋”之衡言，并非别有深意。《释要》深得当时主讲老师马一浮先生称赞，“亲为题词”予以表彰“晓邨（金先生字）以半年之力尽读‘三传’，约其掌录以为是书”，“岂所谓‘箴膏肓、起废疾’者耶！”<sup>⑦</sup>

### 三、敦诗笃礼：据《礼》言制，善说《诗》义

金景芳先生基于对“六经”的系统认识，约于1942—1944年，完成《经学概论》一书，综论经学相关问题。《经学概论》探讨“六经”产生的先后顺序说“大抵《礼》《乐》先起，《诗》《书》次之，《易》《春秋》最后。”<sup>⑧</sup>这一判断，与先生对先秦时期“四教”的认识有关。先生认为，至晚在春秋时期，“诗、书、礼、乐已并称四教”<sup>⑨</sup>。如《左传》载赵衰称赞郤穀“说《礼》《乐》而敦《诗》《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礼记》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皆是明证。

四教之中，礼的地位尤其崇高。《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以至“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义”是伴随社会伦理、政治等级而产生

① 《金景芳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页。

② 《金景芳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页。

③ 《金景芳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9—60页。

④ 《金景芳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⑤ 《金景芳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⑥ 《金景芳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

⑦ 《金景芳全集》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636页。

⑧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85页。

⑨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86页。

的，是社会生活中区分及维持父子、君臣、上下这些贵贱等级的重要方式。《礼记·乐记》《礼记·祭义》都说“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鉴于礼之重要性，金景芳尤致力于《礼》的研究，发表了系列研究《礼》书和“礼”制的文章。<sup>①</sup>在系列论礼的文章中，《谈礼》最能集中表现金景芳的礼学思想。首先，关于“礼”的定义，金景芳取《说文》“礼，履也”说，以为“《说文》以礼履二字音同，因用履即践履来解释礼的本义，是对的，但不全面”；而摒弃《说文》后文“所以事神致福也”，以为“是画蛇添足”。<sup>②</sup>在金景芳看来，“礼之为用，主要是对人的而不是对神的”<sup>③</sup>。于是金景芳对“礼”定义说“礼这个概念，应该说是一定社会，由统治阶级制定而为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一种行为准则或规范。”<sup>④</sup>他说“礼”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不是自初民以来就有的，而是历史的产物”。<sup>⑤</sup>具体是什么社会呢？金景芳根据《礼记》《易传》等材料证明，“礼”产生于男女有别的个体婚制时代，也就是人类步入阶级社会的前夜。其次，谈“礼的类别”。金景芳依据《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sup>⑥</sup>将古代的礼归纳为八类，并分别进行解释。再次，谈孔子的“礼”的特点，一是礼中有“仁义”；二是孔子的礼是因时而异的。又次，讲历代对礼的评价，梳理了老庄贱礼，魏晋玄学家轻礼，五四激进派非礼，都有其时代原因，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必纠其偏而求其中正。

金景芳在《中国奴隶社会史》一书中，也设有“礼”的专节谈礼乐问题。认为“礼是西周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它鲜明地反映奴隶制的生产关系。”<sup>⑦</sup>也就是说至孔子之时还延续的礼，是西周奴隶制度的产物。同时他又指出“谈礼，必须记取周代社会的下述两条原则：一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二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sup>⑧</sup>“劳心”“劳力”的划分，合乎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sup>⑨</sup>论断，而这个“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则只有奴隶社会才会实现。金景芳又据《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指出“礼、刑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sup>⑩</sup>也就是说“礼在庶人以上适用，刑在大夫以下适用。礼之所以不下庶人，因为当时庶人以下是奴隶，不被看作是人的。这是周代奴隶主阶级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立场出发所制定和贯彻执行的阶级路线。”<sup>⑪</sup>这就别清了喧嚣一时的“礼是杀人的工具”“是吃人的礼教”等片面说法。

可以看出，金景芳“六经信史”的观念，在《礼》学研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与五四以来人们忌谈礼、视礼为畏途的史学家不同，金景芳特别擅长运用“三礼”资料解决历史上重大的制度和学术问题，如“井田制度”“宗法制度”“分卦制度”，甚至奴隶社会内部阶级成分研究等。用

① 如在《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发表《论宗法制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2年第2期发表《论孔子学说的仁和礼》，《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发表《井田制度的发生和发展》，吉林大学《理论学习》1978年第2期发表《论礼治与法治》，《新长征》1981年第1期发表《漫谈家长制、终身制和世袭制》，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1至4期发表《论井田制度》，《人文杂志》（1982年在先秦史论文集）专辑发表《〈周礼〉、〈王制〉封国之制平议》，《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发表《〈周礼〉简介》，《孔子研究》1994年第2期发表《论中庸》，《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发表《谈礼》，《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发表《释“克己复礼为仁”》等。

② 《金景芳全集》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50页。

③ 《金景芳全集》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50页。

④ 《金景芳全集》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50页。

⑤ 《金景芳全集》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50页。

⑥ 《金景芳全集》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52页。

⑦ 《金景芳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76页。

⑧ 《金景芳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76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页。

⑩ 《金景芳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77页。

⑪ 《金景芳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77页。

礼制讲古史是金景芳重要的治学特色。

礼乐为四教之本，有了礼乐作为行为规范解决现实问题，还需要历史经验以为参考，故《诗》《书》二经相继而起，即先生所言“《礼》《乐》起，而《诗》《书》继兴。”<sup>①</sup>孔子云“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又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文”即《诗》《书》。

金景芳先生关于《书》之研究，内容详后，就《诗》学来说。先生《诗》论主要见于《经学概论》第2章《诗》，其考证《诗》之名，认同孔《疏》所云《诗》有三训，曰“承也，志也，持也”。三训相成，以“志”为主，“志形于言，斯谓之诗”。<sup>②</sup>从“诗以言志”这一功能来看，首先，“诗”与语言相关，金景芳先生云“诗以言志，实与语言相伴，而无待于文字。观童稚学语，辄能讴吟，虽精粗异致，而情文已具。”<sup>③</sup>其次，诗与乐相通，“《诗》被声律，则为乐”<sup>④</sup>。《尚书·虞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即是诗乐相因之证。“要之，乐辞为诗，可以无疑”<sup>⑤</sup>。诗即为语言、乐辞，故古有采诗之制，以观民风。先生因此说《诗》实“规一代之风俗也”<sup>⑥</sup>。

《诗》虽也涉及传述源流、今古文之争等问题，但先生对此并不极力争辩。如论诗之作者问题，先生认为“《诗》录四方之风”，成于众手，“故《三百篇》其皆为谁氏所作，固多无考”<sup>⑦</sup>。论“子夏传《诗》”，先生觉得“似孔子弟子传《诗》者尚多，未宜专属子夏也”<sup>⑧</sup>。而关于齐、鲁、韩、毛四家诗传，先生更是持准公允，说“《诗》之经文，各家大同。解说虽殊，学者择善而从可已，无事争是非也”<sup>⑨</sup>。至于《诗经》学史上争论不休的《诗》大小序作者、真伪问题，先生大致判断说：“《诗序》虽未可辄定为孔子所作，其为孔子之意、七十子后学所传，要无可疑。”<sup>⑩</sup>

相较以上问题，金景芳更为关注《诗》之为教的垂范价值，指出“诗教大行于春秋之世”<sup>⑪</sup>，“《诗》之为教，所以志世风之升降”<sup>⑫</sup>。有鉴于此，先生解《诗》，欲息诸家聚讼，使《诗》学回归四教本义。1963年先生于《文史》第3辑发表《释“二南”“初吉”“三谗”“麟止”》，1984年于《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豳风〉说》，皆关注学者较为疑惑、有碍理解诗义的概念问题，旨在平息《诗》经学史上诸多千古聚讼、无有定论的公案。先生晚年，于《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六经》中介绍《诗》，再次对《诗》学重要概念进行释义，如解“四始”，认为“四始无深义，只是古人书用简编，容易散乱，记住开始一篇，作为标识而已”<sup>⑬</sup>；解《毛诗序》之“六义”，认同孔颖达疏之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sup>⑭</sup>；解“二南”，考证云“南”字古通“任”，《周南》《召南》为“周公所南之国”“召公所南之国”之省语。周、召二公所南之国选取之诗称“正风”<sup>⑮</sup>；解“正变”，认为“正变是编诗之义，不是作诗之义”<sup>⑯</sup>。

①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86页。

②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10页。

③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10页。

④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13页。

⑤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14页。

⑥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87页。

⑦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87页。

⑧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14页。

⑨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91页。

⑩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22页。

⑪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11页。

⑫ 《金景芳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87页。

⑬ 《金景芳全集》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20页。

⑭ 《金景芳全集》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19页。

⑮ 《金景芳全集》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21-4322页。

⑯ 《金景芳全集》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22-4323页。

#### 四、发微阐幽 《易》《书》新解

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漫长的治学沉淀，金景芳先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周易》《尚书》等经典阐释和对孔子全面的研究上来。1979年，《哲学研究》第6期、第11期连载先生《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周易阴阳说和洪范五行说》，宣称“西周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巨大的贡献，一个是存在于《周易》一书里的阴阳说，另一个是存在于《尚书·洪范》里的五行说。前者代表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后者代表古代的原始的唯物论思想。”<sup>①</sup>这正式揭开先生的学术新篇章。

1985至1986年，先生主办当时唯一的“《周易》研讨班”，为高校中青年教师指点学《易》研《易》的正确途径。其讲稿《周易讲座》经助手吕绍纲整理，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同年，汇集先生多年研《易》心得的又一本专著《学易四种》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逾一年，先生又与助手吕绍纲完成60余万字的《周易全解》，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可谓硕果累累，厚积薄发。

金景芳先生弱龄嗜《易》，刻苦钻研，至老弥笃。金景芳视《周易》为哲学著作，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结合经学、史学的方法研究《周易》，多窥古人未至之境。张岱年先生说“景芳先生对于《易》学造诣尤深，早年著《易通》，晚年又著《学易四种》《周易讲座》等书，阐明易学的义理，摈斥关于象数的迷信，同时坚信孔子作《易传》的记载。”<sup>②</sup>颇能反映金景芳的易学研究特点。唐嘉弘先生亦谓金景芳易学“方法科学，论证严密，破治《易》二蔽，成一家之言”<sup>③</sup>。

《周易讲座》《周易全解》《〈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将金先生多年治《易》的心得都灌注于对《周易》的章解句释之中，颇多新颖正大之论。如《周易讲座》将《系辞传》等十篇翼传提前讲解，让读者在通读文字简奥、思想幽邃的《易经》之前，对《周易》编排结构、人文思想、成卦筮法以及全经义例、读《易》方法等有所了解，由孔翼而周公、文王、伏羲，循流以溯源，本隐以之显。在培训班讲解时，先生以康熙御纂《周易折中》为底本，综合各家之说，逐卦逐爻予以导读；植根历史，博采众长，断以己意，开启新知，十分有益于《易》学爱好者的入门与中高级学者的进阶。

《周易全解》一书则抛开前人具体的《易》书，完全用自己语言阐述《周易》的思想内涵，从卦名、卦序，到卦辞、爻辞，卦象、爻象，吉凶祸福，成败利屯，皆娓娓道来，浑然一体。虽然全书由助手吕绍纲教授执笔，但是每成一章，先生必逐字审察，仔细修改，《周易全解》实为师徒二人凝心聚力之作，也是先生《易》学思想的经解表达。自谓“我早岁嗜《易》，遍读说《易》之书，然于其中若干关键性问题，依然瞶瞶。只是于抗日战争期间，流寓巴蜀，值国共合作，读到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受到启示，于是向日所谓疑难问题，不久即涣然冰释。因以新得，写成《易通》一书。及解放后，读了较多的马列主义的书，又有进益，因继续写了《易论》《说易》几篇专题论文。至1989年，我行年已八十有七，垂垂老矣，因念我的薄有所得，来之不易，有必要留下，以备后生参考，遂与我的助手吕绍纲同志合著《周易全解》一书。深知缺点尚多，但自审大方向是对的，有些重要问题，亦基本上解决了。”<sup>④</sup>

《〈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是1996年先生向弟子讲解《周易》的内容，由朱红林整理成书，1998年由辽海出版社出版。书分《前言》《〈系辞传〉新编详解上》《〈系辞传〉新编详解下》《后

① 《金景芳全集》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917页。

② 张岱年《祝贺金景芳先生九五寿辰》，载《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③ 唐嘉弘《〈周易〉研究中的倾向性问题》，载《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

④ 《金景芳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84页。

语》《〈系辞传〉新编说明》《〈说卦传〉略说》六部分。将《系辞传》当成独立而完整的著作来解读,使其更成体系,更加完整。对该书先生非常重视,认为与《中国奴隶社会史》是同等重要的“成名之作”。其特点和创获,先生在《我的处女作与成名作》中有详尽介绍,其一,强调“《周易·系辞传》的重要性”:“孔子作《系辞传》是专门从理论方面对《周易》加以解释的,因此《周易·系辞传》尤其重要”<sup>①</sup>。其二,谈创作动机,认为《系辞》古注韩康伯“比较好,但是太简略,有的还没讲对”,朱熹、吕祖谦注“较为详明,但是也有的没解释,有的解释错了”,加之《系辞传》在流传过程中“有错简、有缺文、有后人误增、误改的情况”,因此在96岁高龄,“对《易》又有了新的理解”之时,先生觉得“应当把我的这些新见解写出来留给后人”,“把《周易》的难点给解决了”。<sup>②</sup>其三,《〈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贯穿了先生的“几点创新”:一是认为“《周易》一书实际上是用辩证法的理论写成的”;二是要区分《系辞传》中“孔子作的原文”和“不是孔子作的东西”,“只解释属于《系辞传》原文的章句,把非原文的章句则删掉或存疑”;三是《系辞传》原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本书用四点理由把它否定了,认为这不是孔子原文,而是后人误增”;四是突破邵雍“错误地用所谓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先天之学、后天之学来解释”《说卦传》的窠臼,“指出《说卦传》为《连山》《归藏》遗说”,发覆阐幽,弥足珍贵;五是对《周易》中“蓍”用“数”,“卦”用“象”做了说明。<sup>③</sup>

对《尚书》做新解是金景芳晚年学术研究的又一进境。关于《尚书》研究,先生早在“抗战”时期在东北大学讲授《经学概论》时就已经系统展开,在现今残存的《经学概论》之《尚书》讲义中,先生系统阐述《尚书》得名、成书、今古文、传述源流、孔子论次等文献问题,还深入解读了《尧典》《禹贡》《洪范》《皋陶谟》等篇记载的“若天”制历、治水“敷土”“四岳”议政、治国“七政”、识人“九德”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也在有关“六经”的论文中,对《书经》问题多有申说。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又以90岁高龄与助手吕绍纲开始对“佶屈聱牙”的《尚书》作系统阐释和研究。先后发表《〈尧典〉新解节选》(《孔子研究》1992年第4期)、《〈甘誓〉浅说》(《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皋陶谟〉新解》(《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5期)、《甲子钩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华书局,1993年第2期)、《〈禹贡〉新解前言》(《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新华文摘》转载)、《〈汤誓〉新解》(《史学集刊》1996年第1期)、《〈盘庚〉新解》(《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等成果。1996年,他与吕绍纲合作的《〈尚书·虞夏书〉新解》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年先生94岁。

《〈尚书·虞夏书〉新解》一书,是先生晚年学术与精力的结晶之作,也是自古史辩派质疑古史古书以来,最重要的拨乱反正之作,甫一出版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著名学者林沄、邹逸麟、詹子庆、陈光崇、郭守信等先生纷纷参与座谈或撰文点评。林沄说“自‘疑古’思潮大盛以来,《尚书》的虞夏书在大多数研究者的心目中……被看作是一种对古代传说的记录。本书作者则对此重新翻案,把虞夏书(除了《禹贡》中的服制部分)都作为信史看待,并使之与作者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形成的中国古史发展观相合,因而在见解上独树一帜。故在对前人注解的取舍、会通和折衷上别具眼光,且多有新解。可断言在《尚书》研究史中必居一席之地,对于中国古史的科学重建自然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詹子庆亦说,该书在“序说”“新解”“总论”三个层面,“在许多方面超过前人和当代人的同类性著作”。陈光崇称赞“著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因而取得了新的成就”。例如书中把《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记载和《论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论述联系起来,认为尧时制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新历,

① 《金景芳全集》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45页。

② 《金景芳全集》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45页。

③ 《金景芳全集》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46-4847页。

“开中国历法的新纪元”，并指出“新历制定以前，以火纪时，视‘天’为‘神’的世界。新历制定以后，人们知道天的主体是日月星，与人生有重大关系的特别是日，而不是神。因而，使人在对天的认识上逐渐由有神论走向无神论的转变，这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sup>①</sup> 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对《新解》中的《禹贡》篇尤其赞赏 “最近有机会读了金景芳、吕绍纲二位先生合著的《〈尚书·虞夏书〉新解》中《禹贡》篇，获益良多，感到是近年来研究《禹贡》的诸著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并对《新解》确定《禹贡》成书“最可能的情况是虞夏之时记录留下了禹别九州，任土作贡的史料，传至后世，到了平王东迁之后，经过一位学者的加工润色而写定成篇”的判断，深表赞同。<sup>②</sup>

金景芳虽然生当学制改革、引进西学的 20 世纪初年，但他在接受新式西学的同时，仍然对故国旧学“经学”情有独钟，终身涵泳寝馈于其中。综观金景芳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果，“经学”是他的一大特点。张岂之曾总结金景芳治学特色说 “思想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结合，这是金景芳学术研究中的另一个注意焦点。”又说 “他的《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论井田制度》《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的科学概念与中国古代史分期》等论文，实际上构成了金景芳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基础。而金景芳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史的若干观点都与他的社会史观点密切联系着，形成一个整体。金景芳的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他是一位有系统的社会史理论的古史专家、古文献学家和思想史家。”<sup>③</sup>

所谓“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的特色，既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表现，也是其对历代大儒的“经邦济国”“经世致用”“淑世济民”优良传统的继承；所谓“金景芳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史的若干观点都与他的社会史观点密切联系着”而“形成一个整体”，正是他在新时期既传承和发展经学而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杰出成就。金景芳先生正是从旧经学而入新史学，又用新史观以治旧经典的一代鸿儒。

责任编辑：张利明

<sup>①</sup> 以上言论均见林运、詹子庆、陈光崇、邹逸麟、郭守信《金景芳先生及其〈尚书·虞夏书〉新解》，《中华读书报》1997年7月23日，第4版《金景芳全集》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958-4959页、第4959页、第4960页。

<sup>②</sup> 邹逸麟《读〈〈尚书·虞夏书〉新解〉之〈禹贡〉篇一得》，《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sup>③</sup> 张岂之《金景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载《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7-18页。